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20年第1期（总第94期）

美国学者谈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秩序与中美关系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编者按：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给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引发了美国学界的广泛思考，这一时期，有关疫情的分析文章也是不计其数。我们选取了美国部分专家学者的文章进行摘编，他们大多在美国战略界享有重要地位，在诸多问题上也存在着激烈的思想交锋：新冠正在改变世界秩序还是并未重塑历史？美国国家治理能力能否经受病毒的考验？疫情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合作的机遇还是“脱钩”的动力？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并未结束，这些问题在短期内也难有明确的答案。本期选编的这些文章为以上重要问题提供了不同角度的思考，对于我们研判形势、展望未来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期摘编的相关文章，供领导和专家参考，不代表我们支持其观点。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目 录

【世界秩序之变】

- 基辛格：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1
- 理查德·哈斯：大流行将加快历史进程，而不是重塑历史…………… 4
- 坎贝尔、杜如松：新冠病毒将重塑世界秩序…………… 11

【美国能力之问】

- 福山：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 17
- 史蒂芬·沃尔特：美国能力之死…………… 23

【中美关系之思】

- 董云裳：对中国将接管全球的恐惧被过分夸大了…………… 30
- 格雷厄姆·艾利森：抗击冠状病毒，中国是敌是友？…………… 33
- 保罗·希尔：为什么新冠病毒关乎中美关系未来？…………… 39
- 柯庆生：一场现代悲剧？新冠病毒与美中关系…………… 44
- 纳迪娅·沙德罗：美国是时候该宣布独立于中国了…………… 52
- 美国学者公开信：拯救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生命…………… 55

【世界秩序之变】

基辛格：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作者：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来源：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20年4月3日专栏文章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现在就像1944年一样，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但是，那个遥远时期与现如今有着重要区别。那时的美国如此有忍耐力，是出于国家的根本性原则。当前，（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国家，则需要有效率和有远见的政府，以便克服前所未有的障碍。维持公众的信任对社会团结、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国家的团结和繁荣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国家机构能够预见灾难、阻止其带来的影响、并恢复稳定。然而，当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的机构将被视为失败。这个判断是否客观、公正，无关紧要。现实是新冠病毒之后，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现在争论已发生的事情，只会使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困难。

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猛烈程度向人类发起袭击。它的传播是指数级的：美国的病例数每5天就翻一番。就在撰写本文时，

还没有治愈的方法。医疗供应也不足以应付不断扩大的病例数。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边缘。检测量不足以确定感染的程度，更不用说逆转其蔓延。成功的疫苗可能需要 12 到 18 个月。

美国政府在避免即时性灾难方面做了扎实的工作。但最终的考验将是是否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以及通过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否维持公众对于美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无论这场危机的爆发是多么巨大或者必要，都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以过渡到“后冠状病毒”秩序（the post-coronavirus order）。

各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应对这场危机，但新冠病毒对于社会破坏的效应则无视边界。我当然希望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但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能够通过单纯的国家努力战胜这种病毒。解决当前的问题，最终必须与全球合作的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我们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美国从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项目中吸取了教训，因此必须在三个领域作出重大努力。

首先，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过去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和根除天花方面取得了医学胜利，或是产生了通过人工智能进行医学诊断等新技术奇迹，这些医疗技术进步使我们陷入了危险的自满情绪。我们需要开发避免大量人群感染的传染病防控技术和相应的疫苗。地方政府也必须不断进行前沿科学研究、合作和探索，从而始终如一地为保护其人民免受流行病之害做好准备。

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已经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当前的经济危机更为复杂：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规模，与所有人类历史上已知的病毒都不同。隔离、关闭学校和公司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则正在加剧经济阵痛。政府应寻求改善即将到来的（社会、经济）混乱

对最脆弱人群的影响。

第三，维护世界秩序的原则。现代政府是一个由围墙所包围的城市，被强大的统治者保护着，有时统治专横、有时仁慈，但始终强大到足以保护人民免受外部敌人的侵害。启蒙思想家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认为合法国家在于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而个人则无力保有这些。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已经引发了过时主义（anachronism），在这个社会繁荣取决于全球贸易和人员自由流动的时代，由围墙所包围的城市正在复兴。

世界上的民主国家需要捍卫和维持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权力平衡”与“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将使社会契约在各国内部和国际上瓦解。然而这个亘古问题不会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得到解决。各国应该在内政、外交中保持克制，确定问题的优先次序。

我们从阿登反击战（Battle of the Bulge）进入了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不断提高的世界。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划时代的时期。各国领导人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在建设未来的同时应对危机。一旦失败，世界将陷入水深火热。

理查德·哈斯： 大流行将加快历史进程，而不是重塑历史

——并非每场危机都是转折点

作者：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来源：2020年4月7日《外交事务》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因此，人们自然会认为，它将被成为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 COVID-19 出现后的几个月里，分析人士对这场大流行之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产生了分歧。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即将进入的世界将从根本上不同于以往。有人预测这场大流行将带来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场危机将引发中国领导力的消亡。有人说它将终结全球化；另一些人则希望它开创一个全球合作的新时代。还有人认为，大流行将加剧民族主义，破坏自由贸易，并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权更迭，或上述所有结果都会出现。

但是，大流行之后的世界不太可能与之前的世界有根本性不同。与其说 COVID-19 将改变世界历史的基本方向，不如说它将加速了历史进程。这场大流行及其应对措施揭示并加强了当今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因此，这场危机与其说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世界过去几十年所处的前进道路上的一个站点。

现在预测危机何时结束还为时过早。危机在多久后（6个月、

12 个月或 18 个月) 结束取决于,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社交距离指南和卫生建议, 快速、准确和廉价的检测手段、抗病毒药物和疫苗何时能够获得, 以及政府能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多少经济援助。

然而, 危机过后的世界不会面目全非。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全球合作的衰落、大国间的不和, 所有这些都是 COVID-19 出现之前的国际环境的特征, 而这场大流行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在大流行结束后的世界, 这些特征将变得更加显著。

“后美国”的世界

当前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明显缺乏领导力。美国并没有团结全世界共同努力对抗病毒或它带来的经济影响。美国也没有号召全世界效仿它解决国内问题。其他国家正在尽其所能照顾好自己, 或向中国等已经度过感染高峰期的国家寻求帮助。

但是, 如果这场危机之后的世界将会是一个美国主导地位越来越低的世界——很难想象今天有人会写关于“单极化时刻”的文章——这种趋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这种趋势在至少 10 年前就已经很明显了。

在某种程度上, 这是法里德·扎卡里亚 (Fareed Zakaria) 所说的“其他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 带来的结果。尽管美国的绝对经济和军事实力继续增长, 但相对优势逐渐下降。但更重要的是, 这是美国意志动摇而非能力下降的结果。在奥巴马总统的监督下, 美国从阿富汗和中东撤军。特朗普总统主要利用经济力量对抗敌人, 但他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 并试图在阿富汗采取同样的行动, 或许更重要的是, 他对联盟或维持美国在处理重大跨国问题上的传统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兴趣。

这种改变是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的诉求之一。该口号承诺,

如果美国减少在海外的行动，把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上，美国将变得更强大、更繁荣。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国在世界上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徒劳的、不必要的，与国内福祉无关。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强化这一观点（尽管它本应该表明，美国国内福祉与其他国家息息相关）。这些人会说，美国必须专注于改善自身问题，将资源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非国外需求，用于黄油而非枪支。但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美国需要而且能够满足国内和国外需求，不过人们很可能仍会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榜样力量。早在 COVID-19 蔓延全球之前，美国模式的吸引力就已经急剧下降。由于持续的政治僵局、枪支暴力、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管理不善、阿片类药物泛滥等，美国所代表的东西对许多人越来越没有吸引力。联邦政府对大流行的反应迟缓、缺乏连贯性，而且常常是无效的，这将强化美国已迷失方向这种早已广泛存在的观点。

无政府主义社会

起源于一国并以极快的速度在全世界传播的大流行是一个全球性挑战。这也进一步证明，全球化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选择。大流行蹂躏了开放和封闭的国家、富有和贫穷的国家、东方和西方。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全球联手应对疫情的迹象。（牛顿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相反且相等的作用力——似乎没有生效。）世界卫生组织本应是应对当前威胁的核心，但实际上它几乎毫无意义，充分说明了全球治理的糟糕状态。

然而，尽管大流行使这一现实变得尤为明显，但在此之前潜在趋势早已显现：全球性挑战早已出现。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无法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但全球组织却未能挺身而出。的确，

全球问题与应对能力之间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大流行为何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可悲但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尽管“国际社会”一词被当作既定事实使用，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愿望，对于当今地缘政治的大部分方面并不适用。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

对大流行的应对是国家性的，甚至是次国家性的，而不是国际性的。一旦危机过去，各国工作重点将转向国家复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人们会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抱有多大热情，况且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遥远、可以搁置的问题，紧迫性不及其他问题。

之所以做出这种悲观的预测，是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应对大多数全球性挑战所必需的，但中美关系多年来一直在恶化。大流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摩擦。在华盛顿，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大流行负责，因为中国政府在疫情暴发后的数周内掩盖事实，没有采取行动，包括未能迅速封锁疫情首先暴发的城市武汉，任由数千名感染者离开并进一步传播病毒。中国现在试图把自己描绘成应对疫情的成功典范，并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其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这只会加剧美国的敌意。与此同时，当前的危机不会改变中国的观点，即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一个历史反常现象，也不会减少中国对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政策的不满，包括贸易、人权和台湾问题。

在大流行之前，两国经济“脱钩”的想法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支持，原因是美国担心自己在许多重要商品上过于依赖一个潜在的对手，而且太容易受到中国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影响。脱钩的动力将会因为大流行而增强，而对中国的担忧只是原因之一。人们将重新关注供应链中断的可能性，并产生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的愿望。全球贸易将部分复苏，但更多的贸易将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来管理。

许多发达国家对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的抵制——这一趋势至少在过去 5 年里已经很明显——也将因大流行而加剧。这部分是出于对输入性感染的担忧，部分是因为高失业率将使社会对接收外来人口持谨慎态度。尽管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已经达到历史水平，且仍将大幅增长（因为一些国家将无法养活其人口），但反对外来者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其结果将是许多人受苦，无法养活这些人的国家背负更大的负担。几十年来，国家衰弱一直是一个重大的全球问题，但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导致更多的国家走向衰弱或衰败。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几乎肯定会加剧这一局面：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政府支付医疗费用和支持失业者所需的支出将导致债务飙升。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其无法满足的巨大需求，而必须满足国内需求的发达国家是否愿意提供帮助仍有待观察。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整个非洲都可能经历“余震”，这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COVID-19 在欧洲的传播也表明欧洲项目失去了势头。大多数国家独自应对大流行及其经济影响。不过，欧洲一体化进程早在这场危机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动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英国脱欧。大流行后世界的主要问题是，钟摆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从布鲁塞尔转向各国首都，因为各国都将质疑，对本国边境的控制是否能够减缓病毒的传播。

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加剧过去 15 年来显而易见的民主衰退。人们将呼吁政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限制人口流动，还是提供经济援助。公民自由将被许多人视为战争的牺牲品或危机中无法负担的奢侈品。

大流行结束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不自由国家构成的威胁仍将存在；事实上，由于人们把注意力放在别处，此类威胁可能已

经增加了。

一个更加混乱的世界

三年多前，我出版了一本名为《混乱的世界》的书。这本书描绘了一个大国竞争加剧、核扩散、国家衰弱、难民激增、民族主义加剧、美国地位下降的世界。大流行不会改变世界混乱的事实，而是会改变世界混乱的程度。

理想情况下，这场危机将促使各国做出建立更强大的国际秩序的新承诺，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达成的协定促成了近 75 年的和平、繁荣和民主。在新秩序下，各国将加强传染病监测和后果管理方面的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为网络空间制定规则，帮助迫于无奈的移民，并应对核扩散和恐怖主义。

但我们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在这场最新的全球灾难之后，历史会重演。今天的世界不具备被重塑的条件。权力分配在更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手中。共识基本不存在。新技术和新挑战让各国措手不及。没有一个国家享有美国在 1945 年所享有的国际地位。

更重要的是，由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导致的疲惫，今天美国并不想承担起领导角色。即使前副总统拜登等奉行传统外交政策的人赢得 11 月的总统大选，国会和公众的抵制也将阻止美国全面恢复其在世界上的广泛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填补美国所造成的空白的愿望和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公众开始支持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曾说过一句名言：政府必须提出“比事实更清楚的论点”，才能让美国人民和国会相信遏制苏联的努力是必要

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今援引中国的威胁同样可以激发公众的支持，但以反对中国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很难适应应对塑造当今世界的全球性挑战。与此同时，呼吁美国人民把解决这些全球问题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更值得考虑的先例可能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一个美国参与度下降、国际动荡加剧的时代。其余的，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都是历史。

坎贝尔、杜如松： 新冠病毒将重塑世界秩序

作者：库尔特·M·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原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现亚洲集团首席执行官；杜如松（Rush Doshi），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规划主任，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研究员。

来源：2020年3月18日《外交事务》

随着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开始自我隔离，新冠肺炎大流行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事件。虽然疫情对地缘政治的影响相比对健康安全的影响处于次要位置，但长远来看——尤其考虑到美国的全球地位——这种影响也同样深远。

全球秩序的改变通常一开始是量变，然后是质变。1956年，英国对苏伊士运河拙劣的干预暴露了自身权力逐步衰弱，标志着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终结。今天，美国政策决策者应当认识到如果美国不积极应对当前的情况，新冠肺炎大流行恐怕会标志着另一个“苏伊士时刻”。

除了那些盲从的拥护者，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最初的疫情应对很糟糕。白宫、国土安全部、疫控中心这些关键部门的失误，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的信心。特朗普总统的公开声明，无论是在椭圆办公室的演讲还是清晨发的推特，在很大程度上散布了困惑和不确定性。事实证明，公共和私营部门都没有为病毒

检测和疫情响应所需工具的生产和配送做好准备。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次大流行加强了特朗普“单边行事”的直觉，也暴露了美国没有做好准备领导全球响应。

在过去的七十年中，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建立在财富和实力上，也是依托于美国国内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召集和协调全球危机响应的能力和意愿所带来的合法性。新冠肺炎大流行正在考验美国领导力的三个要素。目前来看，美国没有经受住考验。

当华盛顿方面踌躇不前之时，北京方面正迅速巧妙地利用美国的错误所带来的窗口期，填补真空，成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努力宣传自身制度，向他国提供物资援助，甚至组织其他政府抗疫。中国明白，如果其他国家将自己视为抗击疫情的领导者，认为美国没有这样做的能力或意愿，这种观念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 21 世纪全球政治和领导地位角力中的位置。

“亡羊补牢”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刚爆发时，中国的失误使自身全球地位蒙上阴影。随着 1-2 月疫情逐步恶化，某些观察人士揣测这次危机甚至可能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在 3 月初，中国宣告抗疫战胜利。大规模隔离、交通停运、全国范围内日常生活基本停止，这些措施因控制疫情扩散得到赞誉。依照官方数据，每日新增病例从 2 月初的三位数降至 3 月中的位数。出乎许多观察人士意料的是，在疫情初期保持沉默的中国领导人，站到了响应疫情的正中央。本月，习近平还亲自视察了武汉。

尽管中国目前还未恢复正常生活，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把抗疫阶段性胜利转化为更宏大的叙事，向全世界广为宣传，把中国树立为未来全球复苏的重要参与者。

这一叙事最关键的部分在于宣传中国抗疫战斗的成功。中国源源不断地发布多语种的宣传类文章、推文和公共讯息，赞扬抗疫成就，强调中国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速度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为世界各国抗击疫情树立了新标杆。”

这种宣传的成功也得益于西方抗疫不利形成的反差，尤其是美国——该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检测试剂盒，意味着美国目前人均检测率非常低；而且特朗普政府始终没有整合美国政府抗疫基础设施。中国则抓住了美国无序的现状，例如一篇新华社文章提醒全世界注意中国抗疫行动的优越性，同时批评“华盛顿所谓政治精英的不负责任和无能”。

中国产，世界用

中国领导人明白，此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可以证明一个崛起大国的领导力。过去几年来，中国外交机器一直在努力思考如何引领“全球治理”改革，而新冠疫情就提供了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想想中国不断宣传的物资支援——口罩、呼吸机和药品。在危机爆发之初，中国就大量采购和生产（以及作为援助接受）了大量这类物资。目前，它有能力向其它国家施以援手。

当意大利请求紧急支援医疗和防护设备时，欧盟没有一个国家回应，而中国公开宣布援助意大利 1000 个呼吸机、200 万只普通医用口罩、10 万个高级别防护口罩，2 万套防护服和 5 万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中国向伊朗派遣医疗团队并捐赠 25 万个口罩。中国还向塞尔维亚捐赠抗疫物资，塞总统批评说欧洲团结不过是童话，“唯一能帮助我们的只有中国”。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已经承诺向美国大量检测试剂盒和口罩，并向非洲所有 54 个国家各捐 2 万个检测

试剂盒和 10 万个口罩。

目前全世界抗击新冠病毒所依赖的物资大部分都是中国制造，这个不争的事实也使得中国在物资援助方面具备优势。中国原本就是医用外科口罩最大的生产国；如今经过准战时动员，中国口罩产量提高十倍以上，所以中国有能力向全世界提供口罩。医护人员急需的 N95 口罩有大约一半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政府要求在华外企生产口罩并直接卖给政府），这些医疗设备都是中国外交的新工具。同时，抗生素对于解决新冠肺炎导致的继发感染非常重要，而制药所需的大部分活性药物成分都是中国生产的。

相比之下，美国的供应物资和生产能力都无法满足其国内的很多需求，更不用说向其他灾区提供援助了。形势不容乐观。美国战略国家储备是美国储备重要医用物资的中心，据测算目前其储备的普通医用口罩和高级别防护口罩只能满足抗疫所需的 1%，呼吸机只能满足 10%。其余必须从中国进口，或国内加紧生产作为补充。另外，中国占美国抗生素市场份额的 95%，而且大多数原材料无法在美国生产。尽管在疫情初期，美国向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但它现在不太具备这个能力，因为美国国内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反观中国，则恰恰能够在全球需求最旺盛的时候提供援助。

但是，危机响应不仅仅是关乎物资。2014-2015 年埃博拉病毒肆虐期间，美国牵头组织十多个国家组成联盟一同抗击疾病的传播。而这次疫情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一直避免谋求类似的领导角色，甚至不跟盟友们协调合作。美国政府在事先不跟盟友通气的情况下，发布了欧洲国家赴美旅行禁令。

相比之下，中国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召集了几十个国家的几百名官员，主要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分享关于当前大流行病的信息，以及中国的抗疫经验。如同中国的外交工作一样，这些召集工作都是在地区层面或通过地区机构来进行的，其中包括与中东欧国

家（通过“17+1”机制）、上合组织秘书处、10个太平洋岛国以及非、欧、亚洲的其他机构进行通话。而且中国非常努力地宣传这些工作。几乎所有中国对外宣传机构的首页都在报道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物资和信息支援，强调中国政府抗疫措施的优越性。

如何引领

在面对新冠病毒以及更广泛的挑战时，中国追求全球领导地位的主要资产是人们对美国政策的认知——认为它不足且重点放在国内。因此，中国最终能否达成目标既取决于中国，又取决于美国。在当前的危机中，华盛顿方面仍有可能扭转局势，但它首先得证明自己有能力扮演领导者角色，包括处理国内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协调全球抗疫对策。

这些任务中首要且最为紧急的就是阻止疾病在美国的传播并保护易感人群，与其说这是个地缘政治问题，不如说是国内治理的问题。但美国的处理方式会带来地缘政治影响，而不仅限于它是否能重树人们对美国疫情响应的信心。比如，如果联邦政府立即支持扩大国内普通医用口罩、高级别防护口罩和呼吸机的生产规模并予以补贴（这符合大流行期间的战时紧迫性），那么既可以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又可以减缓全球物资稀缺性，从而帮助到其他国家。

尽管美国目前无法满足大流行的紧急物资需求，但美国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持续保持的全球优势可能有助于研制疫苗，这才是化解当前危机的真正方案。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激励美国实验室和公司开展医学“曼哈顿计划”，研制疫苗并快速进行临床测试，然后展开批量生产。由于这些努力成本高昂，且需要巨额的前期投资，如果政府慷慨资助并对成功生产疫苗予以奖励，肯定能做出积极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政府应对不力，但各州和地方政府、

非营利机构和宗教组织、大学以及企业并没有消极等待联邦政府先采取行动。美资企业和相关研究人员已经在研制疫苗方面取得了进展——尽管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广泛使用。

然而，美国在重点关注国内工作的同时，也不能直接忽略全球协调、一致应对的必要性。只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解决与旅行限制、信息共享以及关键物资流通相关的全球协调问题。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成功发挥了这种领导作用，这一次它也必须这样做。

美国要发挥这种领导作用还需要与中国开展有效合作，而不是纠缠于哪方的疫情响应做得更好的唇枪舌战之中。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面对中方的质疑，美国只应在必要时进行回应，但总体上要保持克制，不要让中国话题占据本国抗疫资讯的显赫位置。对大多数正在应对疫情挑战的国家而言，更希望看到政府传递的公开信息强调全球共同挑战的严重性以及可能的前进方向（这些案例应当包括民主社会面对新冠肺炎的成功对策）。为了全世界的福祉，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可以合作：疫苗研制、临床试验以及财政刺激措施的协调；信息共享；工业生产动员（比如就高级别防护口罩关键原材料或呼吸机零部件生产开展合作）；向其他国家联合提供帮助。

最终，新冠病毒甚至可能成为一记警钟，推动气候变化等需要中美合作应对的其他全球性挑战取得进展。这样的举措不应、也不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对中国力量的让步。相反，这将有助于恢复人们对美国未来领导地位的信心。在当下这场危机中，美国可以通过做好事来获得成功，这跟处理更广义的地缘政治是同样的道理。

【美国能力之问】

福山： 到底什么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

来源：2020年3月30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今年1月，当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流感在中国爆发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体制阻碍了关于疫情严重性的信息传播。但现在的情况对民主政府来说不那么乐观了。欧洲现在面临着比中国更大的疾病负担，仅意大利一国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中国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然而意大利人口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事实证明，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感受到类似的压力，他们想要淡化疫情的危险，无论是为了避免损害经济，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是这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是如此。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准备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损失了两个月的时间，造成了测试设备和医疗用品的持续短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报告的新病例数量正在趋于平稳。据报道，在英国的中国学生对鲍里斯·约翰逊政府采取的宽松政策感到震惊。

大流行消退后，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简单的二分法。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

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尽管可能较小）。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将自由裁量权下放给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任何一套现有的法律或规则都不可能预见到各国将面临的一切快速变化的新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人士的能力和他们的判断，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在将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的过程中，信任是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民主体制下，公民必须相信行政部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不幸的是，这种信任正是美国今天所缺少的。

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必然有弱势的政府，因为它们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和法律程序。但是，所有现代政府都有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因为它们需要一个强大、有效地现代化国家，在必要时能够集中部署权力，以保护社区、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自由民主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它平衡了国家权力与约束机制（即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权力机构（行政部门）和主要约束机构（法院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同的民主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都是不同的。这一点对美国与对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国家而言都一样，尽管美国的政治文化对集中的国家权力、被神圣化的法律和民主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

美国宪法是在《美国联邦条例》式微的背景下制定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极力支持“行政权的活力”（energy in the executive）。他完全理解对行政权进行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约束的必要性。但汉密尔顿也认为，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法院和国会都不可能采取果断的行动。

国家的危险会在战争或国内叛乱时期出现，也可能产生于不可预料的新情况，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流行病。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种类应视情况而定，在和平时期看起来适当的做法，未必能在战争或危机时期适用。

因此，宪法第二条确立了行政部门的地位，它的权力和权威在建国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增长。这种增长是由紧急状态下对强有力的行政的需要推动的，例如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08年、1929年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动员了100万人的军队，尽管联邦的人口不足2000万；当为欧洲战争提供物资的美国铁路陷入绝望的混乱时，伍德罗·威尔逊把它们收归国有，让铁路变成了国有企业；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绕过国会实行了租借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动用数千亿美元支持具有系统性关键作用的金融机构（包括几家外国机构），而国会几乎没有监督这一行动。

可以看出，在必要时，美国往往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权力。在拉丁美洲，立法机关经常授予总统紧急权力，但这些总统在紧急状态结束后，会继续保留这些权力并成为独裁者。我们今天在匈牙利和菲律宾看到了类似的权力争夺。相比之下，一旦危机过去，美国往往会将权力交还给社会。军队在1865年、1918年和1945年迅速复员；威尔逊在危机过去几年后将铁路交还给私人所有；“9·11”之后，根据《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授予行政部门的权力已逐渐收回。

因此，尽管美国一开始可能行动迟缓，但一旦加快速度，它可能就能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能力。由于美国的国家权力是以民主程序合法获得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它比其他政权更持久；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可以以中国无法做到的方式，汲取和采用

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此外，尽管联邦制瓦解了权威，但它也为新想法的诞生提供了由 50 个州组成的实验室。在本次疫情中，与陷入困境的联邦政府相比，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们一直愿意更快、更果断地应对疫情。

民主国家将紧急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威胁。但是，放权的意愿和权力的有效使用取决于一个前提：信任行政人员将明智和有效地使用这些权力。这才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一信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首先，公民必须相信他们的政府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和能力，能够秉公做出最好的判断。能力仅仅与政府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受过适当培训和技能的人来执行各自的任務有关，即从当地的消防员、警察和卫生工作者到政府的执行人员，能否在诸如隔离和救助等专业问题上做出更高级别的决策。2008 年，美联储绝对拥有信任：其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是一位深入研究大萧条的学者。美联储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而不是由任人唯亲的政治家组成。

第二个基础是对高层的信任，在美国的体系中，也就是对总统的信任。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在各自的危机中都享有高度的信任。作为战时总统，这三位成功以他们自己的身份象征了国家的斗争。乔治·W·布什在“9·11”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也享有这种信任，但随着他对伊拉克的入侵，民众开始质疑他们通过《爱国者法案》授予他的权力。

而今天的美国则面临着一场政治信任危机。特朗普当选的基础是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 35 - 40% 的人口，他们在过去的四年里被灌输了关于“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阴谋故事，并被教导不去信任那些不积极支持总统的专家。

特朗普总统还持续诋毁和破坏他认为敌对的机构：情报界、司

法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近年来，许多行政机构的职业公务员不断减少，一些责任重大的职位要么落到代理领导手中，要么落到总统的政治盟友手中，比如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理查德·格伦内尔（Richard Grenell）。党派人士正在对联邦机构进行清洗，将个人忠诚置于能力之上。特朗普似乎很有可能将备受信任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排挤出局，原因是福奇公开反对特朗普。

以上情况都凸显了对第二种信任——总统及其政府班子的信任的挑战。特朗普在担任总统的三年半时间里，对一半以上没有投票给他的人，他从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建立信任。最近，一位记者问他会说些什么，这是一个任何领导人都能轻易回答的简单问题，但特朗普却对这个问题和发问的记者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由于特朗普不愿认真对待新型冠状病毒，许多保守派人士开始否认我们正处于危机之中，并坚称，围绕该病毒的恐慌是民主党推翻特朗普总统任期的阴谋。特朗普本人在短暂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战时”总统后，宣布他希望在复活节前重新开放这个国家。他承认，选择这一天不是因为流行病学的原因为，而是因为这将是一个“美丽的”的日子，在这一天教堂将十分热闹。他可能还在盘算在重新开放的那天上演一场全国性的感恩节庆典，在他的计划里，这种庆典可能会对他的连任机会产生影响。

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引发的强烈的不信任，以及他们向支持者灌输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将产生可怕的后果。民主党坚持要求在周五通过的2万亿美元救助法案中纳入使用公司救助基金的透明度要求。但特朗普政府在签署该法案时坚称，它不会受到这一条款的约束，就像它在弹劾程序期间拒绝接受国会的监督一样。这将使得任何为了帮助受困企业或地区而动用的紧急权力，都将受到事后的质疑，并受到任人唯亲的指责。因为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一直乐于奖

励裙带关系。

最后，我不相信我们能够就哪种政体更有能力在大流行中生存下来得出普遍性结论。到目前为止，尽管美国的表现没那么好，但韩国和德国等民主国家在应对危机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政体类型，而是公民是否信任他们的领导人，以及这些领导人是否领导着一个称职而有效的国家。在这一点上，美国不断加深的部落主义（tribalism）让我们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史蒂芬·沃尔特：美国能力之死

作者：史蒂芬·M·沃尔特，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来源：2020年3月23日《外交政策》网站

美国在专业知识方面的声誉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来源之一。然而，新型冠状病毒足以将之终结。

无论美国政府如何回应，美国终究无法完全从新冠疫情中幸免。截止目前，即便像新加坡这种在应对疫情方面达到“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的国家，也出现了数百例确诊病例。然而，特朗普政府那迟来的、利己的、混乱的和音盲般的（tone-deaf）反应，却会使美国人丧失数万亿美元和成千上万个本可被挽救的生命。即便“由于缺乏准确数据而使风险被夸大”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特朗普的执政方式和政府的反应失误依然挥霍了公众的信心，使其后续采取的更加符合标准的回应也站不住脚。尽管他矢口否认，但特朗普依然要对美国今天的状况负责。

然而，这并非美国遭受的唯一损失。这种史诗般的政策失败并没有使美国“再次强大”，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美国作为一个行事有效的国家的声誉。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建立在三个支柱上。第一个支柱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大结合。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体量也最高水平的经济，拥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这些特征最终使得美国能够缔造和维持其

竞争对手无法匹敌的军事力量。这些资产的聚合，使美国在全球拥有最强的话语权。

第二个支柱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没有哪个国家会赞同美国政府想做的所有事情，甚至于美国的一些州也几乎会反对联邦政府所寻求或代表的一切。但是，很多国家都明白它们会从美国的领导中受益，并且通常愿意与美国保持一致。尽管美国几乎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行事，但因为利益一致，美国很容易说服其他国家与她同行。

第三个支柱则是对美国能力的广泛信心。当其他国家认识到美国的实力、支持美国的目标、相信美国官员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这些国家更有可能追随美国的领导。但如果它们质疑美国的力量、智慧或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那么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必然会受到侵蚀。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美国领导人透露出自己是个无能之辈，那么其它大国又为何要听取美国的建议呢？简而言之，在能力方面享有声誉，可以成为关键的力量倍增器。

美国人曾享有的光辉声誉是数十年建构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工业实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道路、铁路、桥梁、摩天大楼、水坝、港口和机场所构成的网络，曾经使来到美国的外国游客眼花缭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马歇尔计划和登月计划等创举都提升了美国的形象：在美国的土地上，人们知道如何设定远大的目标，并最终将其实现。

甚至诸如越南战争的失误也没有完全破坏包围着美国能力的光环。的确，冷战的和平结束以及美国在 1990-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驱散了“越战的幽灵”，使得美国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看上去是可以被效仿的“显学”。此外，持续的技术创新浪潮（包括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所有这些花哨的创造），都

使得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认为美国是一个精英化的、有成就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国家。难怪包括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在内的专家们会将美国模式描绘成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告诉有抱负的国家：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穿上“金色紧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就必须变得更像美国。

然而，过去的 25 年里，美国在挥霍其宝贵声誉（负责任的领导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却做得格外“出色”。它们可以拉出一长串的违章罚单：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实习生不负责任的调戏；小布什政府忽视了“9·11”之前的恐怖袭击警告；安然丑闻和马多夫骗局；对 2005 年卡特里娜飓风和 2017 年玛丽亚飓风的笨拙反应；无力赢得或结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不明智的干预；2008 年的华尔街危机；波音 737MAX 客机的空难；以及共和党的领导多引起的“政府关门”，等等。我们也不应忘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以及其他许多人长期隐瞒的犯罪行为，以及与前者关系密切的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肮脏故事——他在纽约监狱中的适时死亡，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他（以及其他人）的不法行为。

与此同时，美国一直自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具能力的官员、运转最好的企业、最先进的金融公司和最贤达的领导人。然而，前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对苏联生活的描述，似乎比美国人所承认的更符合美国人的切实生活：

“（我们）监守自盗，收受贿赂，在报告中、报纸里、甚至在讲台上撒谎，一边相互授予勋章，一边沉迷于谎言。整个国家全都如此——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紧接而来的是新冠疫情的爆发。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令人尴尬的惨败（尽管已经被多次警告），不过这种局

面也完全可以预见。他漫长的商业生涯验证：相比于领导者，特朗普更像是一个表演者；相比于管理复杂的商业运作，他更擅长蒙骗他人和逃避责任；他杂乱无章的个人生活同样释放出了清晰的信号。自上任以来，特朗普完善了谎言的艺术，逐步将管理团队中真正的专家清除，取而代之的则是二线的雇佣文人、谄媚者及其不称职的女婿。当面临需要成熟的领导才能解决的突发性复杂问题时，特朗普不可避免地会处理失当，然后推卸责任。这是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角色失败，即便在情况更为糟糕的时代也不会出现。而令人惊讶的是，人们都只是对此略感惊讶。

美国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可以做出正确乃至更好选择的声誉，又是怎样被挥霍掉的？我不能确定，但是我有一些大胆的猜想。

问题的一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其辉煌历史的傲慢。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是现代世界上最幸运的国家，美国人甚至开始认为成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必须去争取、培育和保护的的东西。尽管出现了前文所述的诸多警示，但这种自满情绪却使美国人愿意下注在完全没有经验的领导层身上。

我倾向于认为，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被放宽的评价标准以及拒绝追究民众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许多的大学中看到，成绩通胀（grade inflation）的趋势根深蒂固，教师们少有动机对差劲的论文进行严厉批评，而学生们则将更多的关注放到体育队伍而非真正的学术成就上。最近的大学招生丑闻更是暴露出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有钱的父母会不遗余力地让孩子进入其力所不能及的大学，而大学本身也同样为校友子女（“学校遗产”）或主要捐赠者的后代预留名额。

我关注高等教育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这一行业最为了解，但上述问题却并不局限于此。在当代的美国，即便首席执行官们出现

管理不善（比如波音），也可以带着数百万美元的“金元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离开；小布什政府内的高级官员和外部鼓吹的“啦啦队”欺骗了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使美国卷入了一场愚蠢的中东战争。可是，他们之中却几乎没有人遭受到不利的职业影响或个人后果；华尔街的公司可以融合贪婪、漠视和欺诈来重创经济，但没有人会被调查，更不用说被起诉；功勋卓著的将军们喜欢在遥远的战场中“坚持到底”（staying the course）而又无法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却可以作为受人尊敬的专家，退休进入公司董事会并谋得高位。与此同时，告密者和恪尽职守的公务员却因为试图履行誓言而遭到诽谤、解雇甚至更为严重的对待。当正直和奉献没有回报，而失败又得不到惩罚时，一个国家的能力必然会受到损害。

进一步推测的话，我怀疑更为广泛的自利文化潮流也是原因之一。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不是圣徒，但他确实将自己的成年生活奉献给了公共服务，并告诉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然而，当罗纳德·里根成为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府是敌人，“贪婪是好事”（引自电影《华尔街》），市场就是一切，公共服务要被贬低，傻瓜才会去纳税。数十年来，美国人花费大量时间来清理公共机构，但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对真正的“公共问题”却毫无准备。特朗普本人就是这种趋势的典范：一个严肃的国家，怎么可能选择一个明显不称职的且拥有长期失败与欺瞒记录自我推销者作为国家领导人呢？

我是否夸大了这个案例？也许。的确还有很多的美国公司持续着出色而创新的工作，还有成千上万的科学家与学者们致力于寻找真相而不是赚快钱，还有很多地方、州和联邦的政治家与公务员更重视善举而非寻求连任或中饱私囊，还有很多敬业的教师和努力的学生在美国教育系统的各各层级之中。但是，腐败现象也同样普遍存在。

如果这种趋势没有得到逆转，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会继续衰退。这并不是因为美国抛出“美国第一”的理念并有意选择脱离世界，而是因为全世界不会像以前那样认真地对待美国的理念或建议。他们也许会倾听，他们可能会不时地表示赞同，但对美国领导人所寄托的敬意却会逐渐褪去。一旦新冠疫情结束，美国人很可能会懊恼地发现其他声音（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这并不是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但这个世界将会与美国人所习惯的有所不同。在变化的临界地带，世界政治的宽广轮廓和世界经济的某些重要方面，将不再会如从前一般偏袒美国。

这种情况能够得到解决吗？我不知道。文化腐朽不能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甚至“耶利米哀歌”来解决。人们或许希望当前的危机能够提醒足够多的美国人：让贤能而可靠的人担任关键领导职位至关重要，让相关人员为腐败、任人唯亲或完全无能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无论你喜欢的是强政府的福利国家还是弱政府的自由主义国家，你首先应当希望它拥有渊博而敬业的专家，从而可以采取具有能力的领导。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他都需要为其政府配备可以胜任被指派工作的人员，而不是那些因为对某个人忠诚或谄媚才被选中的人。

美国人需要反思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获得招募和奖励的都是那些最善于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正是这样一个政治体系，花费了数月时间和数十亿美元来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却最终要让国民在三个白人老头之间做出选择。就此而言，美国人应该反思：花费一整年的时间去选举一个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义？事实上，其他先进的民主国家都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但即使我们现在身处这种情形，也让我们废除荒谬的选举团制度——它确实是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遗物，在系统地剥夺全国大部分地区选民的权力。

展望未来，政治的根本变革可能是我现在仅能看到的一线希望。

当前，美国正在经历自 20 世纪 30-40 年代以来最大的危机，但昔日的美国比现在更能应对这些挑战。当时，上一代的美国人最终应声而起，向本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做些什么。现在，美国人必须记住过往的经历，抛开过去几十年的傲慢、分裂和放纵，证明他们的国家仍然有能力找到什么需要去做——然后，他们就会去做需要去做的事情。

【中美关系之思】

董云裳： 对中国将接管全球的恐惧被过分夸大了

作者：董云裳（Susan Thornton），原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目前是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来源：2020年4月7日美国财经杂志*The Barrons*

中美两国为应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而展开的口水战令人沮丧。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此时需要的是“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不是指手画脚和无端的抨击。我们的社会是有韧性的。我们终将度过难关，但每一次推特上的攻击与指责，都使得中美携手共克难关的机会渐渐消失。

目前中美之间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双方都认为对方的任何一个决策都旨在颠覆、损害或篡夺对方的利益。连中国向其他急需援助的国家提供医疗援助都招致美国的非议和中伤。更不用说中国是出于责任感而提供援助，生产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而且是第一个面对病毒侵袭的国家，中国明明有足够多个人防护装备可以送到世界各地。

我们仍处在大流行的阵痛之中，然而有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敲响了警钟，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从这场危机中获益：这场危机将动摇

世界秩序，一个新的头羊会横空出世。这些担心被大大夸大了；中国不会因这场危机中而摇身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大国。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中国必须直面她在疫情的早期所犯的错误，她将面临巨大危机后的压力。就像过去一样，中国会利用危机来做出调整，启动改革。

一些人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呼吁“把危险变为机会”是一种落井下石、“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这是对中国古老励志格言的误读，殊不知“危机”的汉字在字面上是由“危”（危险）和“机”（机会）两个字组成的。

那么中国有问题吗？当然有，而且有很多，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有问题是意料之中的。值得关注的应当是，中国是如何学习和改进的。

2003年非典爆发时，我住在成都，虽然有很多人将非典和新冠病毒进行了比较，但很少有人强调中国的的确确从非典中吸取了教训。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中国一直未披露非典疫情。消息流出得很慢，直到一位被感染的医生前往香港参加婚礼，由此更多的人将病毒传播到了全世界。但是在非典之后，中国在疾病监测和卫生系统方面做了很多改进，其中有一些是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建议下进行的。

自非典以来，中国先后经历禽流感、H1N1、中东呼吸综合症、埃博拉、寨卡、非洲猪瘟等多种疫情。中国一直在不断适应中。对新冠病毒的反应似乎被早期的误判和误报所干扰。中国疾控中心直到疫情爆发时才承认病毒确实可以人传人。不过，尽管这些失误可能耗费了宝贵的时间，但令人欣慰的是，对病毒的应对与2003年大不相同。这次的应对非常迅速，湖北的早期封锁是戏剧性的和出乎意料的。可以想见的是，中国将摸清事实，并再次做出改变。

我还要谈谈中国在这场危机中蹩脚的公共外交。中国的管理体

制并没有很好地适应社交媒体、公民新闻和网络视频。在一个脆弱的威权国家，公众舆论可以被绑缚，但也可能会破坏稳定。中国传统上把公众舆论看作是需防范的东西，并花费了大量资源试图约束和塑造舆论。

然而，至少可以说，在一个以全球受众和信息爆炸为特征的时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毋庸置疑，中国人民被国外对武汉的遭遇和苦难的无动于衷感到震惊。例如，《华尔街日报》的题为《中国是‘亚洲病夫’》的时评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正当人们死于无法治疗的病毒之际，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低级趣味的。中国遂以驱逐威胁那些与报道无关的记者，这样的回应也是不恰当的。

中国在这方面的笨拙还表现在去年秋天的一件事上：当一位NBA教练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支持香港的图片之后，中国取消了对整个NBA赛季在中国的转播，而这一事件发生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中国能否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尽快学习和适应新媒体的运作？

西方许多人轻视中国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上的努力，尽管这些努力确实好坏参半。但有迹象表明，一些中国人认为，这场危机为中国公共外交的改变创造了机会。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近日撰文称，“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判断将随着中国自身话语和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关于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她接着列举了几点，包括“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基于事实和行动，因为模糊不清的概念和声明无法令人信服。”

另一位中国前外交官在一份关于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早期应对中“犯了错误”，包括“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但此后中国开始认真对待这些错误并加以纠正。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观念，即中国将利用这场危机进行改革和改进。

我们自己会吗？

格雷厄姆·艾利森： 抗击冠状病毒，中国是敌是友？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美国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首任院长；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i），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助理。

来源：2020年3月27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为了让美国战胜冠状病毒并回到这场噩梦之前的生活，我们是应该把中国当作一个应群起攻之的敌人？还是该承认它是一个合作伙伴，并且与其合作对我们的胜利至关重要？尽管，华盛顿方面对中国的贡献嗤之以鼻，但事实是，如果不让中国参与进来，成为我们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就无法在这场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中取得成功。

目前，在所有人看来，美中之间日益残酷的竞争将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是结构性现实里不可避免的后果：无论谁试图掩盖或否认这一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确实有可能取代美国在所有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在于，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双方政治家面对具体却又无法被单独解决的威胁时，他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找到让竞争对手同时成为合作伙伴的方法。

病毒没有护照，没有意识形态，不受国界限制。当一个健康的人从一个打喷嚏的病人身上吸入飞沫时，无论这个人是美国人、意

大利人还是中国人，其受到的生物影响基本上是相同的。当疫情爆发成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病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与世隔绝，每个国家都面临着风险。今天，77亿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小星球——地球上，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正如肯尼迪总统在解释与苏联共存、共同面对核危机的必要性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都珍惜孩子的未来。我们都是凡人。”

但是，华盛顿的官老爷们（the Blob）把矛头对准中国是逃避现实的——他们试图逃避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特朗普总统坚称这种病菌为“中国病毒”，某共和党参议院拿病毒污名化中国等言行，都助长了社交媒体上阴谋论者的气焰。

我们应该长远考虑。在试图战胜冠状病毒这方面，美国面临的紧迫挑战并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未能调动起与威胁相匹配的反应。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紧急措施实施已实行多周，但美国政府却还在停留在否认的阶段。在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2009年猪流感和2003年非典（SARS）爆发之后，是谁没有为下一种病毒的到来做好准备？韩国在零号病人出现后的几周内就践行了每天为1万名公民提供测试的承诺（而这个数字现在达到了2万），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谁还在为接连不断的借口折腾？

美国要明白，面对自己失败的丑陋事实，美国要正确的认识中国和中国的成功。

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意识到威胁并于1月21日宣布该疫情是“一场危机和重大考验”时，中国发起了令世界瞩目的对抗病毒的激烈战争。这包括封锁了武汉——这个有着1000万人口的城市是病毒最开始出现的地方。几天后，中国在湖北省5000多万人口的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它在城市周围的居民区和公共交通点设置了强制性的检测点，将旅馆、体育馆和学校改造成临时医疗中心。中国还调动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工人、水泥搅拌车和卡车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建

造新的医院（10 天内建成了一座有 1000 个床位的医院），并动员了成千上万的解放军人员负责分发医疗用品和管理运营。

我们绝不能只看中国政府声明的表面。尽管有对中国各种质疑的论调，但目前所有来源的证据都表明，这些努力实际上已经成功地控制住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包括苹果、星巴克和麦当劳在内的美国零售商现在都已重新在中国营业。

今天，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可能阻止冠状病毒感染数百万同胞，杀死数十万人，摧毁我们的社会。如果中国的医学家能够开发出抗病毒药物来减轻对感染者的影响，那么美国应该进口吗？美国当局却坚称，他们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不会批准任何疫苗。一旦中国研发的疫苗在新加坡或韩国被证明是有效的，美国民众会怎么看待我们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鉴于美国各地医院和一线急救人员对 N-95 口罩的急切需求，如果中国准备向美国运送数百万个口罩——就像它最近援助意大利那样——美国人应该欢迎它们吗？如果中国建立的诊断经验被证明是有效的，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它的来源而拒绝学习这一经验？

但我们不应对此抱任何幻想。与此同时，疫情突显出一种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若没有与对方的合作，美国和中国单方面都无法确保这种利益。两国的作为以及不作为，都将对更大范围内领导权的争夺产生深远影响。从未来 12 个月的经济增长，到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再到中美两国在世界各地的地位来看：能否成功应对这场全球瞩目的考验，对中美至关重要。

专注于言词而非行动的“叙事性战争”（narrative war）是一种小题大做。在真正的战争中，尸体可以计数。在经济学中，实际的增长可以产生可见的效益。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绝望的人们对医疗设备的急需却淹没了其他所有言语。

今天，金融市场押注的是，中国基本上已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

战争中打赢了第一仗。在经历了第一季度的大幅下滑后，如果中国经济恢复了强劲增长，而美国又在长期衰退和真正的大萧条之间徘徊，那么美国和中国 GDP 之间的差距将会扩大。若中国通过控制疫情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所谓民主的、权力分散的美国政府还仍在疫情里不断挣扎，那么美国对中国过去采取措施的反对态度，在许多人听来就会像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此外，我们不应该忘记更大的背景，那就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本世纪初，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如今却已超过美国并创造了比美国还要大的经济体。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使美国陷入长期停滞之际，中国成功地迅速恢复了快速增长，这让中国更加感到自信和有底气。除非美国能找到迅速应对目前的冠状病毒检测的办法，否则中国可能会在各种议题上更加果断。

合作的机会

探索疾病知识、发现治疗疾病的药物以及制定预防和治疗方案，本质上都是开放的国际事业。生物医学的进步是通过世界各地实验室的发现而实现的，研究的本质是合作。今天，美国人发表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科学论文中，至少有一位外国合作者；美国三分之一的 STEM 博士学位是由中国学生获得的。

因此，在当前战胜冠状病毒的战役，以及为预防未来由新病毒引起的大流行奠定基础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合作伙伴的作用呢？有三个关键领域需要合作。

合作的第一个领域首先是从基因组到流行病学的的数据。面对新型病毒，只有收集和分析的数据越来越多，我们对其的了解才会越来越多。在试图评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并考虑应对措施时，

不确定性是核心因素。此外，缺乏由各疫情爆发国实验室提供的高质量数据是第二个关键因素。每个国家都需要可信的数据，这就提醒了我们：在像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程序一致和透明度非常重要。

中国科学家很快对新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将其发布到世界各地，这使得一场大规模的全球研究工作得以展开。两周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科学家利用这一序列，确认了病毒进入被感染者细胞的机制。次日，中国的一个实验室证实了这一发现。即使是目前正在进行的寻找疫苗的工作也依赖于早期公布的病毒基因组。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主任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观察到的那样，美国进行的第一次疫苗试验是“我们从获得序列到进入人体的时间最快的一次”。更重要的是，有了基因组信息，科学家就可以比较感染情况，并以类似于构建家谱的方式一丝不苟地绘制病毒的传播图谱。

疫情爆发初期迅速共享数据的行为使得各国能够更好地了解病毒。由于最早的病例发生在武汉，中国医生收集的数据使世界首次得以预估病毒的传播能力。这使得流行病学模型成为许多国家政府应对措施的基础。由于中国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死亡最初的冲击，它为全球卫生专家提供了第一套数据。该数据被用以估计致死率，并通过创建模型来预测该病的范围、传播和严重程度，从而确保了更有力的政策应对措施。

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涉及诊断和公共卫生措施。如果中国开发出一种有效的人员筛选程序，可以在机场、企业和学校进行大规模的应用，那么美国能采用这种方法吗？相反，如果研究人员开发并验证出一种更便宜、更快、更准确的高通量诊断方法，它该被共享吗？在美国每年进口的 220 亿美元医疗设备中，约有四分之一来自关税战前的中国。这些设备对当前美国医疗体系应对国内激增新冠

肺炎病例至关重要。

第三个领域是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为此，哈佛医学院最近宣布了一项与中国同行一起击败新冠病毒的新合作项目。中方合作伙伴的负责人是钟南山，他也是中国政府冠状病毒工作组的负责人。2003年，他是第一个发现 SARS 病毒的人。这家哈佛—广州研究所正试图了解 SARS-CoV-2 病毒的基础生物学以及它与感染者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加速诊疗方法的发展。

例如，为了研发抗病毒药物，科学家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如何感染人类的。他们可以通过识别冠状病毒进入宿主细胞的“门”而获得的线索来设计对应的“锁”。为了进行更好的诊断并监测疾病的进展，科学家们需要识别准确的生物标记。在开发疫苗的过程中，由于不平衡的免疫可能导致一种被称为“抗体依赖增强”（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的现象（即我们体内的防御蛋白反而加速了感染），学界迫切需要定义精确的“免疫相关物”。

如科学家们反复强调的那样，研究中的合作通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科学创新的时代，在冠状病毒这类紧迫课题上的合作利大于弊。在努力应对这一疫情之际，全球各国政府应该牢记：收集和整合数据、共享试剂和工具将需要各大洲之间的密切沟通。

总之，与其相互妖魔化，中美都应该认识到，彼此都需要对方来击败病毒这个致命的敌人。因此，伙伴关系，即使是有限的伙伴关系，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

美国和中国能在同一时间内既成为无情的对手，又成为亲密的伙伴吗？同时持有两个看似矛盾的想法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想成功地击败这个病毒，所需要的不过如此。

保罗·希尔： 为什么新冠病毒关乎中美关系未来？

——北京和华盛顿能解决问题吗？

作者：保罗·希尔（Paul Heer），美国国家利益中心杰出研究员、
2007至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官员

来源：2020年4月7日《国家利益》杂志网站

COVID-19 大流行将对美中关系产生何种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有几个指标显示，随着双方相互指责，并在全球应对工作中争夺信誉和影响力，两国关系会加速恶化。但这场危机也凸显了北京和华盛顿联手对抗病毒、为加强双边合作和建立互信开辟道路的机遇和必要。

不妨回顾一下中美关系在 2020 年初（当时新冠病毒刚从武汉逃离）的轨迹。当时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在几个地缘政治趋势的推动下陷入下行螺旋。首先，“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尤其是 2008 至 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导致双方分歧越来越大。这促使北京发挥其优势，努力扩大全球影响力，而华盛顿方面则开始同时应对国内混乱和国际影响力受到的限制。第二，许多仍有冷战思维的人假定这种分歧反映并加强了双方关乎生存的意识形态竞争。第三，在过去三年中，双边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原因包括贸易战，以及美国对中国经济外交、军事部署和影响力行动的关注上升。

从前三个因素衍生出了第四个因素，即北京和华盛顿都有恣意曲解和歪曲对方战略意图的倾向。北京随处都能看到美国遏制中国和推动政权更迭的证据。华盛顿同样认为中国的行动暴露了其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并将中国在国际上的所有竞争行为视为掠夺性、恶意或“违反规则的”行为。所有这些因素都让双方更难真正理解对方的观点，或承认对方的观点有任何道理。这也使双方更容易将自己造成的问题归咎于对方。

然后 COVID-19 暴发了。不出所料，北京和华盛顿的早期反应反映了这些既存的趋势，即战略上不信任、误解和竞争——由于相互敌视和相互指责，这些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点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关于病毒起源的说法相互对立，以及关于哪国正在更有效地抗击病毒的说法相互对立。

关于 COVID-19 来源的各种阴谋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一名外交官的言论。他提出，病毒可能是 2019 年 10 月美国军人（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带入武汉的。一位美国参议员（还有其他一些人）提出，病毒起源于武汉的一个生物武器实验室。当然，一位似乎代表北京发言的中国外交官与一位在美国体制中只代表自己观点的参议员之间存在重要区别。双方后来的言论都有所收敛。尽管如此，这些阴谋论还是体现了双方潜在的敌意和不信任，以及将病毒的影响归咎于对方的意愿。

事实是，双方在病毒传播的最初阶段都处理不当——原因包括缺乏准备，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迟疑和困惑，逃避对重大危机的责任，以及不愿实施必要的严厉措施。尽管方式截然不同，病毒在两国都被政治化了：中国共产党在疫情暴发早期没有做到透明和诚实，试图以此防止公众批评其能力；特朗普政府不愿承认 COVID-19 的严重性，因为特朗普认为他的政治对手为了削弱其连任前景而夸大了事实。这将在未来给两国政府带来麻烦。

所有的证据——尽管有一些不确定的地方——都表明病毒起源于武汉，但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北京在识别病毒、限制其传播和通知其他国家方面的过失和拖延。但在很多方面，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发生的事情已经无关紧要了。美国目前正承受这场危机的阵痛，而这场危机变得如此严重在更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华盛顿准备不足，而非北京未能遏制病毒传播。

第二组相互冲突的说法涉及到双方如何描述彼此对 COVID-19 蔓延全球的外交反应。不出所料，美国许多评论人士都在强调，北京方面正努力将其在遏制病毒在中国国内蔓延方面取得的成功描述为世界其它国家效仿的榜样——从而证明中国发展和治理模式的优越性。这与疫情在美国暴发之前美国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描述相呼应，即中国的外交政策旨在输出其治理模式，从而败坏美国体系的声誉，并最终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华盛顿加快了自己的公共外交活动，以败坏北京模式的声誉，强调北京对病毒传播的责任，并争取其他需要援助的国家的支持。

的确，北京显然正利用这场危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分，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和一个更加关注和代表中国利益的国际“利益共同体”。显然，北京方面正试图转移人们对其在疫情初期处理不当的注意力，转而强调美国在应对疫情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更多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医疗用品和专业技术。因此，当危机过去后，北京的国际声誉很可能会比病毒大流行之前更好，即使这种声誉仍不及华盛顿。

但与疫情暴发前一样，在经历了 COVID-19 之后，美国不应夸大或歪曲北京在这方面的战略野心。尽管中国正在寻求扩大其相对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且不惜损害美国利益，但它并不想消灭美国或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中国的目标更加有限和务实，因为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全球霸权能够实现（他们对此表示怀疑），也将

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更像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恩惠。北京寻求的是在国际上使其治理和发展模式合法化，以便与其他模式和平共处，增加中国在制定全球治理规则方面的影响力。此外，北京希望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统治，确保外部环境和平，让北京能够直面无数艰巨的国内要务。COVID-19 为北京提供了一个推进所有这些目标的机会，因为它可以声称其体系在国内有效地控制了病毒，并在国外提供了援助和建议。

这足以对美国构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即使人们不相信中国正试图削弱美国，统治世界，这种挑战也是存在的。这种挑战反映了美中两国体制之间普遍存在的战略竞争。作为回应，美国需要做在 COVID-19 之前就已经明确的事情：回到国际舞台上，开始为自己的治理和发展模式得分。遗憾的是，病毒本身的影响使这一点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已经占据了优势，因为从各种迹象来看，它已经度过了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而且它可以提供全球各国急需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知识。美国已经受到了 COVID-19 的重创，但疫情的破坏性影响仍未达到顶点。美国体系的一些缺陷阻碍了其对病毒的应对。美国现在是众多需要中国援助的国家之一。

美国人对这些情况的本能反应是批评北京的机会主义和趁火打劫，并采取措施反击中国的说法，宣传华盛顿对 COVID-19 国际应对工作的贡献。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这可以也应该促使美国激发其竞争和人道主义本能，来应对病毒本身以及北京带来的挑战（北京正利用这场危机获得地缘政治优势）。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些反应可能适得其反——例如要求中国政府为病毒的传播支付赔款，导致相互指责的局面加剧；或者把病毒当作中美经济应该脱钩（特别是消除美国对中国医疗产品出口的依赖）的另一个依据。此类提议将是徒劳，或者将产生问题。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北京当前行动的任何反击都不应阻止中美

利用这场危机来扭转两国关系螺旋式下降——这实际上也是当务之急。如果说病毒让中美改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它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双方能够抛开分歧，认识到朝着共同努力可以带来短期和长期利益。上周，两批杰出的学者，一批来自中国，另一批来自美国，分别发表公开信，呼吁两国政府携手应对 COVID-19 的挑战，努力减轻其影响，开发疫苗，战胜共同的敌人，造福全人类。

COVID-19 并没有改变美中战略关系的基本面。地缘政治、互不信任和系统性竞争一直在推动两国走向对抗和相互指责。此外，双方都在努力加强自己的地位，让对方为任何障碍负责。但这种趋势并非无可改变。北京和华盛顿仍然可以采取行动缓和紧张局势，并开辟一条通往和解与和平共处的道路。但这要求双方更准确地理解彼此的观点和抱负，认识到两国共享的全球利益，尤其是控制 COVID-19 方面的利益，并接受相互依存现实。

美中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兼具竞争与合作。现在是时候该扩大合作渠道了。这有助于两国脱离疫情暴发前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

柯庆生： 一场现代悲剧？新冠病毒与中美关系

作者：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美国前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来源：2020年5月布鲁金斯学会官网

摘 要

这份政策简报援引古希腊戏剧的标准来分析新冠病毒大流行，认为这对中美关系及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个潜在的悲剧。美中在2020年的政治现实本质导致两国在危机初期对疫情处理不当。而迄今为止，美中两国之间及其与世卫组织（WHO）等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浪费了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历史机遇。美中两国以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相互指责和政治驱动的指控，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在病毒传播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际。

本文批评两国对新冠病毒的最初应对，呼吁北京和华盛顿停火，并承诺对疫情早期所有国家存在的问题展开最终的国际调查。简报最后指出，美中应在六个领域寻求合作：分享阻止病毒进一步传播的最佳实践；尽早开发有效的疫苗，提前为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和全球分配做好准备；协助最贫穷的国家防治新冠病毒肺炎；管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可能因疫情而引发的饥荒；优先考虑供应链多样化和国家战略储备来保护全球贸易，而不是经济民族主义和低效

率的生产方式。

导 言

“悲剧”一词在当代话语中的使用，并不像文学和戏剧中那样普遍。当下，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犯罪到火车失事或公交车祸之类的事故，任何可怕的事情都被贴上了悲剧的标签。在古希腊戏剧中，悲剧的结局通常十分悲惨，但不仅仅是消极的结局使悲剧与喜剧截然不同。悲剧需要关键人物的个人特征，通常称之为“悲剧性的缺陷”，也需要这些人物在特定的环境中相互作用，导致他们不知不觉地，而不仅仅是偶然地走向痛苦的深渊。直觉上看，悲剧的结局似乎是可以避免的。但令人费解的是，一旦人们深入了解这些关键人物的性格、缺陷以及故事背景，悲剧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新冠病毒是美中关系乃至世界的潜在悲剧。两国在 2020 年的政治现实导致二者未能在第一时间很好地处理危机。迄今为止，美中之间及其与世卫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互动，浪费了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历史机遇。如果美中这样互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国无法在全人类共同的威胁面前合作，那么我们又怎能指望双方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呢？

悲剧的发生

在疫情之前，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自 2008 金融危机后，特别是 2012-2013 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自信巩固了美国两党的共识，即需要一个更强硬、更具竞争力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在过去几年中，美中贸易战、香港和新疆问题，以及美中在中国沿海争议海域的海军活动，都加剧了双边紧张局势。

但是，如果两国政府都决定同其他各国一道携手应对，病毒带来的威胁本可以为缓和这些紧张局势提供机遇。然而到目前为止，病毒只是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摩擦而非合作。

这就是两种政治制度的悲剧性缺陷的冲突之处。在疫情首先暴发的中国，中国当局在 2019 年 12 月对疫情的应对得似乎非常“不理想”。事实证明，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蔓延到了各个国家。虽然现在美国对这种传染病有了充分的了解，医院也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措施防止病毒蔓延，但许多医护人员和医院工作人员在治疗新冠肺炎患者时仍会被感染。

直到 1 月底，中国武汉封锁整整一周后，世卫组织才将新冠病毒列为全球卫生紧急事，这也可能造成了重大损害。虽然日后的调查可能会更全面地揭示出现延误的原因，但很有可能是中国对世卫组织成员国或世卫组织最高领导层施加政治压力，以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以及世卫组织过度依赖中国等成员国的官方报告所带来的结果。

虽然世卫组织在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上的迟缓，可能延误了世界各地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反应，但对于美国似乎并非如此。讽刺的是，华盛顿已经成为世卫组织的头号批评者。这就是美国悲剧性缺陷发挥作用的地方。在特朗普治下，美国政府降低了科学和专业知识的在其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普遍避免利用多边组织和协议来保护和维护美国利益。与过去几届政府相比，美国驻中国代表团的卫生专家人数有所减少。政府最高层将深厚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政府经验与所谓的“深层国家”联系在一起，特朗普指责“深层国家”试图削弱其执政。特朗普总统本人显然更喜欢根据直觉和意愿，而非仔细研究的结果做出决策。因而，特朗普很早就声称，这种病毒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经济构成的风险有限；它很快就会“奇迹般”地消失，也许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就会消失；最

近，他甚至还称可以将研究注射消毒剂作为潜在的治疗手段。

即使新冠病毒对世界构成的威胁日益清晰，特朗普政府仍然认为疫情被政治对手夸大了。即便世卫组织更早承认这种病毒构成了全球卫生紧急情况，也很难想象这会如何改变美国糟糕的现实。在执行抗击病毒的重大政策方面，美国浪费了至关重要的几周。美国在今年1月底对中国实行的旅行禁令备受吹捧，无论此举多么明智，其对遏制美国疫情显然并未起多大作用，因为病毒早已到来并开始蔓延。以纽约为例，病毒显然是在美国禁止来自中国和欧洲的旅行者入境之前，从中国经由欧洲间接传播到纽约的。尽管政府后来再三声称，病毒检测普遍可用且供应充足，但显然并非如此。疫情初期，各州州长只能自力更生，为医护人员争取防护和医疗设备，有些防护和医疗设备来自中国。

在书写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时，韩国、新西兰和台湾地区将可能被视为自由社会在疫情早期实施有效应对的最佳榜样。不幸的是，美国肯定不会名列其中。

与此同时，由于上述问题，中国的国际声誉在美国、欧洲和印太地区都受到了重大打击。尽管公开承认疫情后，中国采取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举措，努力用医疗设备和专业知识帮助其他国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但新冠病毒似乎更像是一项负债，而非中国外交工作中的一项资产。

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制度层面的不安全感和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和心理层面的不安全感，似乎在以一种典型的悲剧方式相互对抗。这一悲剧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宣扬美国军队在武汉植入病毒的阴谋论中更加突出（他并未被解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因这一离谱指控而受到纪律处分）。

特朗普及“中国病毒”这种种族迫害式的语言来形容新冠病毒，以及他在中国官方修正死亡病例数量后发布的幸灾乐祸的推

特，也是悲剧。人们只能猜测，特朗普很高兴看到这种报道，因为相比之下，这可能会让他自己的政府看起来更有效。特朗普随后不再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但泄露的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Senatorial Committee）关于如何在大选举年回应有关新冠病毒问题的指导要求责怪中国和世卫组织，并赞扬特朗普限制中国旅客入境的举措。这种转移和寻找替罪羊的行为可能会取悦国内共和党，但肯定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使未来与中国的合作更加困难。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团队决定攻击特朗普在疫情最初几周对中国过度软弱，这进一步加剧、恶化了悲剧。在这种党派叙事中，中国显然需要为这次疫情承担责任，特朗普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因为他“向中国人妥协”。拜登的支持者批评称，特朗普允许向中国派发“我们的（防护性）口罩”。这向特朗普表明，在大选年，民主党可能会将中美未来就疫情展开的任何合作“不忠”。

因此，现在我们在促成一出悲剧，其中充满了具有悲剧性缺陷的角色：在中国，政府遭受合法性危机；在美国，一个感到不安全的行政部门（特朗普政府）被一位虚荣的总统领导，这位总统正在竞选连任，并要求他党派的人员永远不要批评他对疫情危机的反应，而是指责中国和世卫组织让病毒传播；一个饱受创伤的反对党（民主党），依旧无法相信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决定这一次“当别人不择手段时，我们不妨也如此”。

我相信，这场悲剧中的所有角色都希望病毒消失，但他们都选择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将责任直接推给他人，使抗击病毒迫切需要的国际合作更加困难。各方都需要进行大量自我批评，以改进日后面临类似挑战的举措（类似挑战几乎肯定会出现）。更紧迫的是，适当的谦卑和自我反省可能会使国际社会在这场持续的危机中加强合作。无法开展国际合作可能会导致生活在疾病、饥饿和经济匮乏中

的数十万甚至是数百万人丧生。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认识到，我们还处于这场危机的早期阶段。想到将来在装备更落后、更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或南亚地区，会有多少人会因为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以及美国两党之间的争斗而死去，人们只能不寒而栗。

建 议

无论之前在武汉发生了怎样的过失和隐瞒，现在的中国储备了很多关于病毒和有效预防的知识。中国还拥有强大的科学界，研究病毒的起源和治疗方法，他们可以和美国科学家合作研发疫苗，并找寻疫苗之外的有效治疗手段，即使事实证明病毒实际上是从武汉某个缺乏防护措施的科学设施泄漏出来的。日后将有机会更详细地评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早期犯的错误，但现在病毒再肆虐，我们应该共同抗击病毒。世卫组织和 20 国集团等其他多边机构应得到支持，以帮助应对可能在全球蔓延的医疗和经济挑战，特别是在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和经济贫困的国家，这些国家很有可能会遭受大规模债务违约。同样，即使国际政治和体制上的缺陷推迟了世卫组织对新冠病毒的初步反应，仍应支持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是国际公共卫生的主要工具，在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之际，因为世卫组织之前未能迅速作出应对就削弱它是不合逻辑的（除了扭曲的政治逻辑）。

以下是美中两国在双边和多边情况下可以寻求合作的六个领域。这些领域将有利于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它们不一定符合华盛顿和北京领导人的国内政治逻辑。该清单具有参考性，但并非详尽无遗，也包括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

分享最佳实践。双方应分享、学习如何减缓病毒传播的最佳实践，包括避免错误的实践。虽然现在指望北京和华盛顿同意对其早期错误进行调查还为时过早，但如果各方原则上承诺在病毒得到控

制和消除后开展此类调查，将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不太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后一次大流行。从长远来看，我们都需要吸取教训，承认最终需要开展这样的调查，这将在短期内减少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

合作研制疫苗。美中两国应共同努力研制疫苗，并保证在疫苗研制取得任何突破后，立即与对方和世界其他国家分享。这可以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进行，也可以在大学和公司之间进行合作。尽管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冲突，但包括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中美科学家仍设法对该病毒开展合作研究，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提前为大规模生产疫苗和全球分配做准备。在世界各地为每个人接种疫苗将是一项庞大的后勤工作，在疫苗开发出来之前，需要对这一点未雨绸缪。在分配过程中，即使是几个月的延迟也很容易造成巨大的生命损失。如果各国就哪国何时应得到疫苗展开政治斗争，这将对未来就任何问题开展国际合作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帮助最贫穷的国家抗击病毒。通过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等高度脆弱地区的医疗反应能力，合作缓解发展中国家的痛苦。2014年，美国和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展开有效合作，应对非洲的埃博拉危机。尽管世卫组织在2020年1月在应对疫情上出现了各种问题，其仍应成为这一合作的主要行为体。美国和中国应该支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分发粮食、消除阻碍援助的分配瓶颈的工作。

合作管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违约。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面临系统性债务违约，而这可能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连锁反应。这显然需要更多多边合作。“二十国集团”（G20）很好地应对了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再次呼吁G20应对这场全球衰退。新冠病毒危机还应为全球银行家提供机会，推动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等国际发展融资组织。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这些组织能够减少贷方之间的冲突。不就债务重组展开的合作，贷款机构之间以邻为壑的策略可能会重创

国际经济。在此背景下，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送的许多“不透明”的双边基础设施发展贷款可能显得尤为突出。

将发展战略储备置于经济民族主义之上。在全球化和跨国供应链的世界里，各国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在急需商品上对外国供应的依赖。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全球贸易总体上是世界经济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其大幅减少将可能加剧而非减轻贫穷，并让人们更易遭受疾病和饥荒的侵袭。保护全球贸易的两个潜在解决方案包括全球供应链的多样化，那么某一个国家（例如中国）在最终成品的供应上便没有那么举足轻重了。这将意味着世界各国的经济互动会比今天更为复杂，相比于每个国家都试图自主生产所有产品以减少脆弱性，它将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为了补充这一全球主义战略，应鼓励各国就所需的医疗和其他用品建立更大的战略储备，而不是简单将此类产品的所有生产转移本国。作为战略储备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将为全球效率和财富带来巨大的机会成本，也可能会以破坏稳定的方式影响国际安全政治。一直以来，出于安全目的储存国际商品等类似做法在能源部门得到了有效利用。

为了推行这一具有建设性的议程，所有国家都应该呼吁停火，不要在病毒早期爆发和全球传播问题上指责其他国家。为了促成这一外交停火，所有国家都应承诺对他们如何应对危机（包括期间犯的错误和不当行为）展开最终的国际调查。世卫组织应参与此类调查，美国应积极同世卫组织开展合作，提供帮助和指导。基于本报告此前讨论过的原因，中美两国都可能不太乐意听到这一调查的最终结果。但是，如果两国现在不合作而继续争斗，还会有数十甚至数百万人死亡。如此一来，两国的声誉和外交地位将遭受更大的损失，远高于两国事先同意接受一些批评所带来的损失。中国和美国应该拿出自信大国的风范，而不是像古希腊戏剧中那些缺乏安全感、带有悲剧性缺陷的人物那样行事。

纳迪娅·沙德罗： 美国是时候该宣布独立于中国了

作者：纳迪娅·沙德罗（Nadia Schadlow），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

来源：2020年4月5日《华盛顿观察家报》网站

美国人现在知道，他们不能依靠中国甚至美国的盟友来生产美国在大流行期间需要的产品。因此，美国政府现在应该做在冷战期间所做的事情——开创一种新的制造业策略。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可怕的一个方面是，人们意识到美国不再自给自足，无法生产足够的基本物品来抵御和对抗病毒。从 N95 口罩到呼吸机再到基本药品，美国都依赖中国。现在，美国看到中国以供应短缺威胁美国，并利用这种贸易手段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获取地缘政治利益。

多年来，这种对中国的依赖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界日益担心的问题，因为美国在军事装备零部件到稀土矿物等一系列领域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增长。虽然此前美国能够暂时无视这种令人不安的认识，但今天美国面临的短期紧急需求使其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应对这种过度依赖的难点在于美国陷入了僵局。一些政治领导人呼吁经济逐渐脱钩，以降低风险。其他人则认为，脱钩将给消费者和企业带来巨大成本。

与此同时，无论这场争论如何展开，美国现在就可以开始实施一项有意义的变革，这不仅将缓解美国在主要产品上的依赖，还将

提供一份路线图，降低美国对依赖程度最高的产品的依赖。这是为了让美国在敏捷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敏捷制造（有时被称为制造 4.0 或数字制造）旨在利用机器人等技术和更灵活的流程使工厂更容易快速改变其生产的产品，使得制造商能够快速响应需求。想想福特汽车公司和特斯拉现在是如何生产口罩和呼吸器的。面对商品短缺或其他供需变化时，它们能够轻松而有效地作出响应。

投资敏捷制造将给美国带来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效益。此类投资可以立即支持制造业的某些部分转向 COVID-19 的应对工作，还可以在中国把制造业力量武器化时提供一个后备计划。敏捷制造还将使就业更具弹性，从而帮助美国制造业。城镇将不再依赖于一种产品或一家公司，如果该产品不再被需要或该公司破产，工厂可以快速进行改造，生产其他产品。这对消费者也有好处，因为适应消费者口味或技术变化的新产品可以不断生产出来。最后，敏捷制造还可以给技术、航空航天和国防等出于战略原因需要快速更新的部门带来巨大的好处。

个别政府机构呼吁采取更敏捷的方法。去年秋天，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级官员珍妮特·伍德考克（Janet Woodcock）敦促药品行业采用先进制造技术，改善药品质量，解决药品短缺问题，并加快上市时间。上周，空军采购主管威尔·罗珀（Will Roper）呼吁实现“工程数字化”，并强调了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一个例子。当时，美国在 5 年内生产了 6 架不同的“世纪系列”战斗机（相比之下，生产 F-22 和 F-35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早已制定了敏捷制造战略。其“中国制造 2025”计划将“数控工具和机器人”列为重点投资领域。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意识到德国是敏捷制造的领导者，收购了许多德国企业，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敏捷制造企业之一库卡。

敏捷制造不仅是商学院讨论如何提高效率时可以引用的一个案例，而且是一种战略工具，为美国今后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具体途径。三项具体措施可以成为起点：

首先，需要一种战略方法，让美国政府能够绘制战略行业地图，以便它们在必要时生产相关零部件。政府可以根据工厂改变其制成品的速度对它们进行分类。尽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为美国需要保护的行业提供了一份“防御地图”，但主动制定的战略地图可以让美国转守为攻，开始改变美国制造业。

其次，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必须通过税收激励和贷款担保促进敏捷制造。政府必须消除不利因素，如国防部对专用工装的合同要求。更进一步说，如果地缘政治因素威胁到战略产业的供应链，政府机构应该要求制造商具备迅速重组、继续生产的能力。在地方层面，工业城镇不应受制于单一产品。它们必须能够适应市场供求的变化，这对国家和当地社区都有好处。

最后，私营部门也要发挥作用。它应该把敏捷制造作为其初步投资评估的一部分。从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敏捷制造有助于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政府可以根据需要为相关行业提供威胁评估，而为高管层服务的组织可以评估朝敏捷制造发展的成本和收益。

权力和地缘战略影响力取决于武器系统，也取决于速度和敏捷性。COVID-19 向美国和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制造业的弱点。敏捷制造是让美国变得更强大的一种方式。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这可能关乎胜负。

美国学者公开信： 拯救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生命

当地时间 2020 年 4 月 3 日，90 多名美国知名学者和前政府高官联合发出公开信，呼吁美中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危机。美方的公开信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和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共同发起。签名人还包括来自美国两党的前政府高官。公开信全文如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全球卫生疫情大流行之中，威胁着数十亿人的生命和生计。这种冠状病毒跨越国界和国籍，在发现疫苗之前，任何一个国家的一群病例都将危及世界各地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的命运从未如此明确地联系在一起，也从未如此迫切地需要美国的领导和有目的的国际协调。

我们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在国内地方、州和联邦各级发起一场更有效的运动，阻止疾病的传播并保护我们最脆弱的人群。除了解决我们自身的缺点，美国必须与盟国和朋友合作，一起迎接冠状病毒的共同挑战，领导一个更广泛的全球努力控制，在国外战胜病毒，特别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否则他们将会遭受这种疾病的肆虐。

没有美中两国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合作，任何抗击冠状病毒的努力，无论是在国内拯救美国人的生命，还是在国外抗击这种疾病，都不会取得成功。中国的工厂可以生产对抗病毒所需的防护装备和药品；医务人员可以分享其治疗该病的宝贵临床经验；它的科学家

可以与我们合作，开发出消灭疾病急需的疫苗。通过 20 国集团这样的论坛，美国可以努力制定一个全球共同应对的框架，将中国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享相关科学数据；比较最佳医疗实践；协调努力，加快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配；协调疫苗和治疗研究、试验、生产和分配的资金和临床试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国内外以人人都负担得起的代价消灭这种疾病。

尽管最近在抗疫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在应对冠状病毒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最初的掩盖；持续缺乏透明度；未能与美国和国际医疗当局全面合作；其公然的宣传攻势将危机归咎于美国。未来的揭露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这些署名人认为，合作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

华盛顿和北京最近采取的步骤表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性，并正在共同采取一些初步步骤。这项声明的目的是鼓励朝这个方向采取进一步的步骤，并表明两党对这种合作有广泛的支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提出了这一声明。

我们正在推动的这种合作是有先例的：在冷战最严重的时期，美国和苏联共同为全世界接种了天花疫苗。诚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在利益和价值观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美国不需要放弃自己的利益或价值观，也不需要宽恕中国处理危机的方式，就能在冠状病毒问题上展开合作。这些差异也不应妨碍太平洋两岸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科学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合作，而这些合作构成了任何联合努力的核心。

为了及时防止或准备未来的疫情爆发，需要对全球冠状病毒大流行评估：它的起源；它能传播的条件；肩负应对的机构失败；事关数十亿人健康和安全的医疗供应链至关重要的潜在脆弱性等。但就目前而言，随着大流行席卷全球，重点应该是找到在国内外共同遏制和击败这种病毒的决心。两国和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命将依靠它。

签名者：

1. 玛德琳·奥尔布赖特 (Madeleine Albright)，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主席，前美国国务卿
2. 格雷厄姆·艾里森 (Graham Allison)，哈佛大学肯尼迪学校教授，前美国国防部长助理
3. 杰弗里·贝德 (Jeffrey Bader)，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4. 夏琳·巴尔舍夫斯基 (Charlene Barshefsky)，美国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 (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 的资深国际合伙人，美国前贸易代表参
5. 马克斯·鲍克斯 (Max Baucus)，前美国驻华大使，原参议员
6. 白莉娟 (Jan Berri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7.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Robert D. Blackwill)，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原总统副助理、负责战略规划的国家安全副顾问
8. 杰弗里·布莱奇 (Jeffrey L. Bleich)，前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兼总统特别顾问
9. 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WestExec Advisors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前美国副国务卿
10. 约翰·布里奇兰 (John Bridgeland)，Civic Enterpris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前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
11. 尼古拉斯·伯恩斯 (Nicholas Burns)，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
12. 威廉·伯恩斯 (William J. Burns)，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前美国副国务卿

13. 库尔特·坎贝尔 (Kurt M. Campbell), 亚洲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前美国国务院分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14. 迈克尔·切尔托夫 (Michael Chertoff), 切尔托夫集团联合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15. 张大明 (Tai Ming Cheung),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
16. 柯庆生 (Thomas J. Christensen),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计划主任; 前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
17. 孔杰荣 (Jerome A. Cohen), 美国纽约大学美亚法律研究所创始主任
18. 威廉·科恩 (William Cohen), 科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前美国国防部长
19. 郭需德 (Peter Cowhey),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院长
20. 温迪·卡特勒 (Wendy Cutler),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华盛顿特区办公室副总裁兼董事总经理; 前美国贸易代表处副代表
21. 戴博 (Robert Daly), 美国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22. 杜如松 (Rush Doshi), 布鲁金斯中国战略计划主任; 耶鲁大学蔡中曾中心研究员
23. 易明 (Elizabeth Economy),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
24. 加里·埃德森 (Gary R. Edson), 前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兼国家经济副顾问
25. 艾江山 (Karl Eikenberry), 美国前驻阿富汗大使兼美军中将
26. 唐纳德·埃文斯 (Donald Evans), 前美国商务部长

27. 理查德·弗肯拉斯(Richard Falkenrath), 桥水投资公司 (Bridgewater Associates) 首席安全官 ; 前美国国土安全副顾问
28.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
29. 米歇尔·弗卢怒瓦(Mich è le Flournoy), 美国 WestExec Advisors 联合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 ; 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30. 理查·方丹(Richard Fontaine), 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
31. 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计划教授兼主任
32.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33. 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 哈佛大学学者 ; 美国能源部前特别顾问
34. 葛伟宝(Paul Gewirtz),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教授兼主任
35. 葛来仪(Bonnie Glaser),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资深顾问, 中国力量(China Power) 项目主任
36. 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亚洲和日本中心副主席 ;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37. 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 (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集团联合主席, 前美国商务部长
38. 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39. 韩磊(Paul Haenle),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
40. 查克·黑格尔(Chuck Hagel), 美国前国防部长兼参议员
41. 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 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前美国首席副国家安全顾问

42. 韩美妮 (Melanie Hart),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中国政策主任
43. 约翰·霍尔德伦 (John Holdren),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校教授; 前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44. 黄严中 (Yanzhong Huang),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45. 黄亚生 (Yasheng Huang),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46. 洪博培 (Jon Huntsman Jr), 前美国驻华大使
47. 普拉迪普·科斯拉 (Pradeep Khosla),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校长
48. 詹姆斯·克拉里克 (James Kralik), 林登街资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49. 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D. Krasner),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总监
50. 葛艺豪 (Arthur Kroeber), 美国Gavekal Dragonomics创始合伙人兼研究主管
51. 大卫·兰普顿 (David M. Lampton), 美国斯坦福大学Oksenberg-Rohlen学者
52. 迈克·莱维特 (Mike Leavitt), 美国Leavitt Partners创始人; 前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
53. 温斯顿·洛德 (Winston Lord), 美国国际救援委员会名誉主席; 前美国驻华大使
54. 安贾·曼努埃尔 (Anja Manuel), 美国阿斯彭战略集团总监,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
55. 麦艾文 (Evan S. Medeiros), 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56. 德里克·米切尔 (Derek Mitchell), 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所长, 前代理亚太事务助理国防部长,

57. 丽莎·摩纳哥 (Lisa Monaco) , 前美国总统国土安全与反恐事务助理
58. 黎安友 (Andrew J. Nathan)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59. 巴里·诺顿 (Barry Naughton) ,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
60.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 哈佛肯尼迪学校前院长、名誉教授, 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
61. 梅根·L·奥沙利文 (Meghan L. O'Sullivan) ,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校教授; 前分管伊拉克和阿富汗事务的美国国家安全副顾问
62. 欧伦斯 (Stephen A. Orlins) , 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
63. 裴敏欣 (Minxin Pei) , 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
64. 潘文 (John Pomfret) , 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社长
65. 杰弗里·普雷斯科特 (Jeffrey Prescott) , 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66. 米拉·拉普·胡珀 (Mira Rapp-Hooper) ,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高级研究员
67. 伊利·拉特纳 (Ely Ratner) , 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副总裁兼研究总监
68. 苏珊·赖斯 (Susan Rice) , 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69. 约翰·罗斯 (John Roos) , 美国Geodesic Capital合伙人兼联合创始人; 前美国驻日大使
70. 丹尼尔·H·罗森 (Daniel H. Rosen) , 美国荣鼎集团创始合伙人

71. 加里·鲁格黑德 (Gary Roughead), 美国前海军作战部长
72. 陆克文 (Kevin Rudd), 美国亚洲协会研究所所长 ; 前澳大利亚总理
73. 丹尼尔·拉塞尔 (Daniel Russel), 美国亚洲协会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项目副主席, 前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
74. 雷克森·柳 (Rexon Ryu), 美国亚洲集团合伙人, 曾任前美国国防部长查克·黑格尔的参谋
75. 克里·史可 (Kori Schake), 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与国防政策计划主任
76. 夏伟 (Orville Schell), 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
77.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兼中国政策项目主任
78. 约瑟特·希兰 (Josette Sheeran), 亚洲协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79. 温迪·谢尔曼 (Wendy R. Sherman),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教授兼主任,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80. 史宗瀚 (Victor Shih),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副教授
81. 谢淑丽 (Susan Shirk),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教授兼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 ; 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
82. 朱利安·史密斯 (Julianne Smith), 前美国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83. 詹姆斯·斯坦伯格 (James B. Steinberg), 美国雪城大学教授, 前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
84. 杰克·苏利文 (Jake Sullivan),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研究员, 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总监
85. 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美国哈佛大学大学教授 ; 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哈佛大学校长

86. 汤米·汤普森 (Tommy Thompson), 美国两党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 前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
87. 唐伟康 (Kurt Tong), 亚洲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伙人, 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
88. 弗朗西斯·汤森 (Frances Townsend), 美国麦克安德鲁斯和福布斯公司执行副总裁; 前美国国土安全和反恐顾问
89. 傅高义 (Ezra Vogel), 美国哈佛大学荣誉教授
90. 肯尼斯·温斯坦 (Kenneth Wainstein), 前美国国土安全顾问
91. 杰西卡·陈·维斯 (Jessica Chen Weiss), 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
92. 戴蒙·威尔逊 (Damon Wilson), 前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兼欧洲事务高级总监
93. 罗伯特·沃克 (Robert O. Work), 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94. 托马斯·赖特 (Thomas Wright),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95. 莎伦·袁 (Sharon H. Yuan), 美国亚洲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合伙人兼总法律顾问; 前美国财政部贸易和投资政策副部长兼中国事务高级协调员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